

我们曾经年轻

作者：董丰

(上接2023年1月20日第B4版)

“革命”没有死角

离开了黑云压顶的京城到了民风淳朴的草原，时时思念家中的亲人，担忧他们的安危，尤其是在“牛棚”中的妈妈。一封家信的邮寄需要一两个星期，我们急盼着家信，互相写信又都是报喜不报忧。人首先要生存才能讲发展。乱世中大家都活着，都平安就是最大的慰藉。

学生离开北京后，文革并没有结束。清队运动在学校里深入展开。老师们人人过关，查历史，查三代，查立场，查言行。女附中又有三个老师在高压下自杀身亡，其中包括享有盛名的周学敏老师。她温文尔雅，有一头乌黑整齐的短发和清秀的面容。她的“周学敏教学法”曾经被光明日报整版报导。老师们的悲剧并不都是“红卫兵小将”造成的，那是文化大革命整体绞杀文化的结果。在内蒙得到这样的消息让人十分心痛。

顶着“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的虚名，牧区的贫下中牧对我们十分信任，也让我们参加他们的文革批斗会。不可想象的是一共连老带少一百零几口人的大队，被批斗的人就呼啦啦站了一大排。有王爷家属巴勒比姊妹和儿子，有好几个牧主和富牧，有一个由于小孩子倒牛粪灰、死灰复燃造成草原火灾的责任妈妈，还有去外蒙看望过父亲的“叛国分子”。在群众“伯亥，伯亥”（低头）的怒吼声中，被批斗的人低头弯腰90度接受批判。

一共几十人参加的批斗会让人想起了内地的土改，反右和斗争“牛鬼蛇神”。发言的人不多，但是情绪亢进，言辞激烈。喊口号时大家群情激愤。我们不懂蒙语，只做看客，从会场气氛中体会各方的感受。那几个牧主富牧看起来都是身体健硕，有能力、有气质的蒙古汉子。一个批判最猛烈发言最多的是小个子贫牧老布僧，他目光浑浊，身形仪态明显不如。

草原划分阶级成分看各家的牲畜数量和有没有雇用帮工。有劳力，有技术，有经营能力的牧民很容易被打成牧主，富牧。家里劳力不行，有病人，或懒惰，或天灾，或不会经营的人很容易被划为贫牧。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大同社会共同富裕，要让穷人富起来。结果到头来还是贫穷光荣。

从49年到6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了17年了，没有什么理由把曾经划为牧主富牧的人经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的财富再次剥夺，但是这种事情在牧区还是发生了。大队后来发给我们每个知识青年一套漂亮的羔皮蒙古袍和腰带。我的蒙古袍有湖蓝色的丝绸面，宽长的棕色丝绸腰带，很漂亮。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文革中抄家得来的私人财产。

一个批判会开起来几个小时，我们即便听不懂也不能退场。女知青最发愁的事是上厕所，喝下的奶茶总要有去处。草原平坦，无遮无挡，蒙古男人背过身就可以放水。蒙古女人两米外蹲下，蒙古袍就是围墙。我们穿的汉人衣裤遮挡不了隐私，几个女生就相

约离开人群，走多远回头看都觉得别人能看到我们。直到远方会场上的人缩成小点，又走到草原低洼之处才敢解决。如此下来，听会的时间缩短了不少，反正坐在那里也不知所云。

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中国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民族，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在内地还是在边疆。文革给绿色的草原也抹上了血腥的色彩。我们骑马串包走进的人家基本都经过阶级筛选。好在我们语言不通，不用介入当地文革，很多事可以置之度外。

背起药箱

草原的夏季很短，八月下旬就感到秋凉。十月一号秋风习习，我们知青和大队的青壮年一起骑马到公社参加国庆庆祝会，回程时大家纵马扬鞭赛起马来。我骑的一匹栗色马被称为土匪马，据说是由一个被定为“土匪”的驯马高手调教的。虽然马不年轻，但是心气不减，跑起来不超众马绝不罢休。我勒不住它，只好由它尽兴，梗着脖子一直跑到第一。牧民们为我的骑术进步喝彩。我心中高兴，给家里写信时难免渲染一番。

学骑马，学蒙语，和牧民的关系更亲近了。有一个牧民妇女头疼，我给了她几片从北京带来的药，她吃了很快好了。从此有人不舒服就会来问我要药。他们去一趟公社看病太远了，生了小病往往就自己熬着。我对牧区的缺医少药有了切身的体会。我带的备用药品很快送完了。以后有求助者，只好抱歉了。

利用一次到公社的机会我去医务所找刘医生，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些常用药，如果队里有人生小病我可以代为发药。刘医生很认真地告诉我，因为我不是医生，他不可以这样做。我说，社员生了小病请医生，你们跑不过来，他们来一趟公社也不容易。我从北京带的药都送完了，牧民找我，拿不到药很失望。我请他再考虑一下。

再一次去公社的时候，刘医生说可以给我一些常用药。如果我有把握可以谨慎给药，不能确诊的和重病患者要通过医生诊治。发放药品记个人账，年终统一在大队工分结算时扣款。医务所的护士教给我肌肉注射的操作规范，给了我针具。以后队里有重病人时，刘医生下乡诊治后可以把针剂留下，让我按时给病人注射。有了卫生员的责任，我学习医学知识更有动力，常常会在煤油灯下学习到很晚。到牧区插队，我不想最终仅仅成为一个放牧人，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可以让生命更有价值。

牧区的医疗资源十分短缺，能够就近帮助牧民解决病痛，马上就得到他们的信任。我平时把一些常用的内外科药物塞满一个铝饭盒，放在缝合的腰带筒里，绑在腰后随身携带。碰到有需要的牧民就及时发放。那时没有“赤脚医生”一词，我就是个义务卫生员。

业余的医药服务一直持续到70年夏天我回北京探

亲。其间有几个场景让人难以忘怀。

巴彦塔拉的夏草场是北部的一片平原，地势低，平坦辽阔，草种低矮肥美。雨季里流淌的河湾在枯水期留下几个水塘。夏草场北边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山梁，上面是一片平坦的高地。很少有人在那里居住放牧。

平原南北跨二三十里，南边的敖包山是蒙古族祭祀的地方。从山下看山势陡峭，山坡上巨石垒垒，长有低矮的灌木。秋草场围绕着敖包山以及和它东边相连的山梁。

越过敖包山向南远眺，可见乌兰乌拉（红山）和察干乌拉（白山）并排耸立。两山以北是广阔的冬草场。那里草种高大，冬天里枯草可以伸出厚厚的积雪供畜群食用。在冬营盘人畜用水完全依赖积雪。

敖包山和红白两山以及它们连接的山梁实际上只是大地的断层，上山去看又是平缓的草原。从夏草场向南走地势层层走高，山是我们的地理标识。

当积雪覆盖不再融化，各浩特都搬到了冬营盘，蒙古包散落在方圆几十里的冬草场。我们的浩特在冬营盘的最南端，红山脚下的一个小盆地。冬天烧火取暖用的羊粪砖和蒙上羊毛毡的一排牛车已经在蒙古包外组成了夜晚羊群宿营的挡风墙。我的牛群夜晚会歇息在东边百米外的一个旧营盘上。

一天傍晚刚刚把牛群赶回营盘，有乡亲来报一个牧民老汉病了。病人住在冬草场北段，离我们有几十里远。我匆匆吃过晚饭，带着药盒出发。从冬草场向北地势渐渐走低，看不到明显的地标。天将黑，我出门时看好方向，认准了一颗星星，骑马上路。

很快黑夜降临，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浩瀚的夜空里群星闪烁。地上散雪被风吹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狼嚎，并不让我在意，我们年年打狼，狼对骑马人有所畏惧。狼不怕骆驼，因为骆驼只会对狼喷出胃里酸臭的草浆，牧人骑在骆驼上很难保护羊群。路走了不到一半，我的马忽然惊恐闪躲，原来是在黑暗中看到地上的白色兽骨。好在我双腿夹紧马肚没有掉下来。

因为白天要放牛，到比较远的蒙古包送医送药经常要在晚上。夜行在荒原上让人感到孤单冷寂，但是知道前方有人在等你，只能策马前行。天空上星转斗移，我需要不断调整和指路星星的角度，走了一两个小时，开始怀疑行进的方向。估摸着离牧民家不远了，就信马由缰。老马识途，比人更敏感更熟悉周围的环境，常常可以出其不意地带你到达心中的目的地。

儿子前年要走了我刚刚完成的一幅马的十字绣。今年看到我在画马的油画时，忽然说发现我对马情有独钟。我才意识到对马的喜爱不经意间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在牧区我们每个人都有大队分配的一匹马作为个人坐骑，一个牛倌还有两匹额外的马轮换使用。如果三匹马体力都不太好，还可以调用其它马匹。

——待续——